

## 編後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兩篇文章，對佔據當今中國大陸文化批評顯學地位、冠以「後」字的各種理論，提出敏感而尖銳的批評。趙毅衡着重檢索93、94兩年的文壇議論，指出這些「其理論根據來自於西方激進主義」的論說，具有清算80年代文化熱和回歸傳統等新保守主義的特徵。徐賁一文從理論角度分析中國式的「第三世界批評」，指出其特色在於闡割這一理論的現實對抗性，與80年代興起的新寫實主義小說創作的非政治化傾向相表裏。正因其如此，中國的第三世界批評才有可能在當今官方政治與商業聯手造成的氣候中，成為一枝獨秀的文化新潮。相信他們的觀察和評論會引起大陸學者的關注與回應。

崔之元在本期再次申論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的見解，並答覆幾位評論者。本刊一連三期以「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為題的討論也暫告一段落，但今後我們仍將不時刊登學者們在這一重要問題上的意見。

另一方面，本期有多篇文章與上述切近當代中國文化學術現狀的熱門話題，保持了相當距離。饒餘慶的書評，使我們了解法國學者如何看待香港前景，這在過去，是很少人注意的。從雷頤介紹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研究清代樸學的著作，以及張鳳所寫孫康宜教授新書的書介，我們可以看到明清士子學術風尚和精神的轉變以及婦女詩詞的繁榮。這和陳俊杰分析明清社會結構僵化以及女子守節現象，恰好成為似是相反的兩極。張倩紅和鄭曉江分別探討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以及中國避邪文化特點的兩篇文章，都寫得細緻而有心得。同時本期「科技文化」的面貌，也略有改變：我們發表了兩段生動感人的科學史史料，並且將「科技訊息」的篇幅稍為減少了。在「經濟與社會」欄，喬健以簡潔宏觀的筆法，勾畫出人類學在中國的歷史和發展困境，並預測中國人類學學者將對該學科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

如果說讀了本期「百年中國」三篇文章，可以加深我們對「理想主義在中國」這一問題的理性認識的話，那麼，再讀錢鋼的〈百年松筠庵〉就會更加感慨。1992年以來，商潮席捲中國，成為神州大地上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形勢，而理想主義則黯然褪色。今年年初，作者再次憑弔以「公車上書」之地而著名的「松筠庵」，他站在這個擁擠平凡的北京大雜院中，體會1895年4月上千名關心國事的舉子的熱情，並反問：他們是不是「比百年後我們中的多數更高貴、更率真、更有血性和凜然風骨」？讀後令人難以平靜。